

政府推动与经济发展

苏南模式的理论思考

万解秋 著

改革与国情研究书系

复旦大学出版社

序

1992年即将过去。白天，参加了一个全省经济形势分析的座谈会，听到各种不同议论：有人认为，当前经济形势是空前未有的好；也有人认为，在肯定主流的前提下，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过热”问题。从经济增长率看，江苏今年的发展速度在本省是超历史的（仅次于统计不甚可靠的1958年），同时不仅高于其他各省市区，并且在世界上也属罕见。所以如此，主要是有苏南的乡镇企业作为“加速器”，如市、县大多增长50%以上，有的一年几乎翻了一番。奇迹出现在苏南，魔力发源于乡镇企业。对苏南模式，我们应当深入探索其奥秘。展望未来，有必要从对它的现实剖析入手。

晚上，读了万解秋同志的书稿，很有启发。对乡镇企业和苏南模式，多年来大家关心它，写出了无数篇文章，出版了一系列论著。其中很多观点，颇有中国特色或江苏特色。但是，并不能认为真的已经充分认识了它，亟待从不同角度去进一步揭示其规律。本书在这方面确有新的开拓。

对苏南的乡镇企业，费孝通同志不久前在苏州的一次会议上赞扬它是“正宗”的乡镇企业。很多同志肯定它，依据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这种所有制特色何在？本书提出“政府推动型经济”，有独到的见解。所谓政府推动，既非市场化，又非政权化。前者，不同于个体、私营或某些股份合作制经济，后者，不同于国有或地方国有经济。它是传统力量、市场机制与行政组织三者溶合生长而成的特殊经济形式。特别是提到社区因素，是这种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重要点。苏南模式的活力在此，成就来于斯；但是，局限和弊病也出于斯。

本书对苏南模式的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容易被理解和接受。把发展起点定在产业效益的部门差异上，所以才有结构转换，从农业内部到外部（非农产业）。于是取得初期效应，基本上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并塑造了双二元结构的形式。回顾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史，人们是熟悉的；而从本书看，则升华到理性思考层次。

重要的是随着上述历史任务的完成，苏南乡镇企业进入了成熟期，固有的隐疾也渐次暴露。速度外延，效率递减，反差明显。对此现象，本书有相当精采的阐述。政府推动，原来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动力，现在成了阻碍：一是行政目标的重要地位和越来越重的攀比压力；二是地方财政预算规模与增长速度有着直接联系。出路在于发展模式的转换，即利用市场机制与多元产权体系的动力替代政府的行政推动力，造就经济长期发展的自我调节功能。这可以认为是本书的精华和结论，换句话说：“消灭乡镇企业！”。

顺着本书的思路，联系当前我省经济形势的错综复杂性，我想借此机会谈谈自己的看法。无疑，乡镇企业（其前身是社队企业）的异军突起，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八十年代的经济发展，乡镇企业不妨与改革、开放并列为三大因素或三大动力。我们对其功绩并不是认识够了，却是还有许多评价不足之处。尽管这样，我们不能不看到它的内在弱点。这是由于，与人民公社体制联系在一起，社（乡）办社有，队（村）办队有，这种社区所有制并未摆脱政（尽管是基层政权）企不分的羁绊。它的发展因此也有两重性：一方面，在市场取向的引导下，与未经改革或改革尚未到位的国有企业比，它有机制优势，得以脱颖而出，后来居上，甚至能占有“半壁江山”；另一方面，它的发展始终带有政府推动色彩，在速度与效益之间难以择定，影响了健康成长。不正视这点，评价乡镇企业也会陷于另一种片面性。

随着改革的深化，特别是择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乡镇企业面临着新的课题：如何从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进到与市场经济合拍，需要又一番变革。从珠江三角洲传来的信息，一种是全面推行股份合作制；一种是“老乡”与“老外”结良缘。如深圳的宝安县，在撤县建（特）区后，村、镇不再存在，乡镇企业终于被“消灭”了。苏南的乡镇企业，在结合为三资企业后，技术上和管理上有所提高，继续显示生机，成为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依托；但是，这仍含有政府推动意味，所以仍不免是速度第一、效益其次，增长中潜伏着消极面。不揭示这点，无助于它继续发挥主力军作用。

对苏南模式，我们这些人是视其为宠儿的，从它诞生之初，就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唯其爱之深，所以期望也切，盼它茁壮成长，渐成正果。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但是，停留于政企不分的社区所有制形态，难以适应改革形势的需要。何况，我们的目标是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两相对照，现在的乡镇企业存在不少稚幼的胎记。抹去这些胎记，乡镇企业不再是乡镇企业，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企业。凤凰般涅槃，展翅高翔。苏南模式，作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之一，也将有其崭新的含义。

研讨乡镇企业，常是稍纵即逝地落后于现实的。本书的努力十分可贵。联系九十年代新的现实，又有不少新事物等待我们去探索。我希望有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尤其是像万解秋同志那样已是饱学之士，能够跟踪追求、持之有恒，与苏南乡镇企业一起前进，必将如入宝山，获得丰盛的果实。虽然乡镇企业或迟或早会转化为非乡镇企业，但是，它将以更雄伟的姿态屹立在苏南土地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它将永远是我们值得为之付出辛勤劳动的宝贝。

沈立人

1992年12月30日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前 言

我从事构思与写作《政府推动与经济发展》一书，前后历时四年之久。在我刚刚着手分析研究这一问题时，国内学术界对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已十分热烈。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已有各种报刊杂志介绍与分析，并出现了若干种著作。很多问题似乎已有定论，再在这个领域探索似乎已无多大价值。但我正在这时才步入这一领域，而又不甘心就此放弃这种努力。于是，就在他人的丰硕成果上，试图再来从事一次小小的“秋收”。结果，我找到了一些问题的线索，发现人们在陈列各种发展模式时，都急于给其定性画谱，相互比较优劣。而忽略了在这些模式背后的作用机制。其发展的规律性还远未揭示开来。因此，我将我所熟悉的“苏南模式”作为例证，展开了分析。结果，就形成了目前的这本小册子。

显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观察与分析苏南模式及其代表的发展方式，它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只有揭示其发展与演变的规律，才能认识这一模式的本质，以及它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全部意义。根据大多数文献的表述，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就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与农民的共同富裕道路。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背后隐含着什么？形成共同富裕的前提与后果是什么？这些恰恰才是经济学所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在本书中把“苏南模式”的运行方式概括为一种“政府推动型经济”，意即政府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起着—个主导性的作用。政

府之所以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一个主导者的作用,它的物质基础就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而正是在政府的主导作用下,农村经济发展才呈现了种种特有的规律性。

那么,这个政府推动型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是什么呢?它事实上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资源动员的行政性质,即地方行政机构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二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导向;三是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社区特色。行政力量,市场机制与社区因素三者相结合,维系着政府推动型经济的运行与再生。

究竟是政府、市场,还是社区组织在对经济发展起着主导的作用,这是人们看法颇不一致的问题。有一种倾向认为苏南模式的经济是行政属性的,政府与乡镇企业的关系类似于国营企业与主管局之间的关系,因而将其定性为“政办企业”,“小国营企业”。而另一种倾向则强调乡镇企业是集体所有的,是由地方创办的,它主要接受市场调节而不纳入计划控制轨道,因而是民间性的企业。显然,这两种分析都有各自的根据,但都只强调了一个方面。事实上,二者是可以并存的。地方政府所属的经济可以是非计划性的,其创办的企业完全可以在市场空间里生存。进一步看,地方政府的行为,尤其是基层的乡、镇、村行政机构的行为,也有企业化的倾向。其投资决策与经营管理行为,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集团型的公司企业。因此,说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者与承认市场的主要调节作用是不矛盾的。它甚至在地方财政包干体制与集体所有制名义下,可得到更快的扩张。这已为 80 年代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实。

但是,政府毕竟是政府,那怕是最末端的行政机构,它也与独立的公司企业在行为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一是在追求的目标上存在差异。作为独立的企业,它可能以利润或企业职工的人均收入极大作为目标,这是一种纯经济的目标,而政府追求的目标,往往是多元化的,它要求经济上的利益,如财政收入,预算外经费等等,但

它也要追求其他社会目标与行政目标,如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本地区劳动者就业水平、社会公共福利,等等。二是在利益的实现途径上,存在差别,企业实现其目标的根本途径主要在于收益的增长与效率的提高;而政府追求其目标,既有经济发展与收益增长之途,也有协调管理经济社会发展、调节收入分配等政治性途径。三是在决策行为方式上,政府与企业之间有很大的不同点。作为独立经营的企业,它完全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策,而地方政府作为行政系统的终端,在考虑经济活动的时候,自然要受到上级行政机构的牵制,它必须在符合上级行政系统的意图与政策范围内作出选择。显然,即使是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事务,也存在着上级行政系统的控制干预。在此状态下,基层行政机构为了自身的行政目标与行政利益,有时就不得不首先考虑上级的指令,甚至不惜以牺牲地方经济利益为手段,来贯彻行政指令,体现行政意图。这就是行政控制体制下常见的一种症状,即唯上不唯下。

需要深入分析的问题是在这种政府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中,上述决策方式,决策行为对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将产生何种影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规律性”。

苏南农村所处的特殊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给了地方政府在初期工业化过程中大显身手的机会,并使发展过程烙下了政府推动机制的痕迹。利用行政机制动员剩余资源发展非农产业是地方政府的特长,它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内把闲置资源组织起来,形成生产能力。这就是初期工业化过程中快速的外延型扩张方式,它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快速的外延型扩张方式或迟或早要受到资源价格上升的限制,并引起效率的递减。行政推动机制在此时事实上已经面临着挑战,经济发展需要改变型式,转换动力机制,但行政机制并没有就此引退,它仍然在竭尽全力地推动经济进行冲刺。这种过分亢奋的状态尤如一个染上失眠症的病人,迟早会引起机能失调。这就是我

们现在看到的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

正因如此,要求得到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摆脱目前的效率递减困境,需要改变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其中最关键的是从体制结构方面作出改革与调整,减弱行政机制对经济发展的直接介入作用,更多地引进与完善市场作用机制。这既是苏南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所要求的。

经济体制的组织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是经济学最注目的焦点,科尔内教授的《短缺经济学》是在微观领域里对这一问题最全面的理论阐述。但是,经济体制的组织结构与推动机制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型式和过程同样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恰是尚未被充分论证的。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它虽然改变了正统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结构变革作为分析研究的主要对象,以期说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无论是古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还是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它们的分析都同样以既定的组织结构作为体制前提,探讨的是该种体制特征下投资、就业增长、结构转换、积累形成,收入分配等过程,以及各种政策的效应等问题,而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一个重要事实,即各国的经济组织制度结构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个制度结构本身就是影响经济发展进程与发展形式的重要变量。即使是从一个国家内部看,各个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制度结构因素方面的差异,并引起了发展政策方面的实质性的差别。这也很难用“都是一个政府领导,怎会有制度结构因素差别”这样一句话来简单地否定。所谓不同的模式,其实已远超出了某些政策上的差异,其背后就包含了某些制度结构上的不同点。难道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之间不是存在着重大的制度结构差异吗?

因此,在本书中分析的政府推动型经济及其发展模式不仅仅是对以苏南为代表的特殊类型经济的理论说明。这种经济发展模

式在我国广大的地区同样在生长与发展,因而对其发展规律的概括同样也适用于广大的农村地区,甚至于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过程。而更广泛地说,它对于所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类型,都具有适用意义。

我们现在都已经接受这样一个命题,即经济学要分析说明的是一种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即所谓的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分析政府推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要说明的同样是一个效率问题。显然,这种分析要求的是一种客观的实证性的剖析,即实际结构与过程是怎样,理论表述与结论也就怎样,即使有价值判断标准,也应在分析概括的基础上,才有意义。这样,这种分析概括往往与某些人、某些机构所想象的不一致,与当时的宣传口径更不协调。这有可能使一些人产生疑问,你为什么总要找毛病,总要说出人们不愿意听的话来。对此,我们只能说,经济学就是一种社会生理学,它的功能就是要解剖这个社会,解释这个社会。

本书的写作,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阶段,中间因作者的学术访问而中止了两年。随着时境的变迁,我觉得书中已有的分析判断在经过了一段时期后并没有失去意义,只是部分资料已显得陈旧。这也使得作者在搁置了几年后又继续写作,把全部分析结论连贯起来。

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得到了国家教委中青年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苏州大学财经学院徐文华副教授的热心帮助,许多思想也是经过讨论以后形成的。石恂如副教授也为作者提供了一些现实的资料。我更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苏荣刚同志,正在我为书稿的出版问题发愁时,他热心地承担了本书的编辑与出版工作,并多次与作者商谈稿子,提出意见。没有他的热心帮助,本书就不可能出版问世。在此,谨向以上热心相助的

各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 者

1992年10月于苏州大学财经学院

目 录

序
前 言

沈立人

第一章 政府推动型经济	(1)
一、引言.....	(1)
二、政府推动型经济的基本特征.....	(2)
1. 资源动员的行政性质	(3)
2. 资源配置的市场导向	(5)
3. 经济发展的社区特色	(9)
三、体制寻根:政府推动型经济的渊源.....	(12)
1. 体制结构演变与政府职能转变.....	(13)
2. 环境因素的特殊作用.....	(14)
第二章 结构转换:发展的起点	(17)
一、引言	(17)
二、结构能量的积聚与释放	(18)
三、结构转换的制导方式	(26)
1. 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吸力模式”.....	(26)
2. 封闭式的动员型模式.....	(32)
四、城乡分离的二元化结构转化模式	(39)
五、结构转换中的发展与矛盾	(46)
第三章 农村工业化与初期效应	(52)
一、引言	(52)
二、政府推动下的农村工业化	(54)
1. 工业化的组织.....	(54)
2. 工业化的进程与基本特征.....	(62)
三、工业化的初期效应	(67)
1. 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就业增长.....	(70)

2. 农村经济总量的扩张与结构转变·····	(72)
3. 农业劳动生产率出现回升·····	(76)
4. 农村综合经济水平的提高·····	(77)
四、初期增长的代价·····	(83)
第四章 速度战略与棘轮增长 ·····	(87)
一、引言·····	(87)
二、初期的外延扩张——一种基本的发展手段·····	(88)
1. 经济扩展的路径·····	(89)
2. 外延扩展:初期发展的基本手段·····	(92)
三、速度战略——初期发展的延伸·····	(95)
1. 速度战略的定义·····	(95)
2. 速度战略的成因·····	(97)
3. 速度战略:两种截然对立的评价·····	(102)
四、增长的棘轮·····	(104)
1. 棘轮增长的形成机制·····	(104)
2. 增长过程的实际形态·····	(109)
第五章 经济增长的陷阱 ·····	(115)
一、引言·····	(115)
二、效率递减的基本事实与一般的解释·····	(116)
1. 原材料涨价引起效率递减·····	(117)
2. 税负及摊派因素·····	(119)
3. 经济规模因素·····	(120)
三、经济增长方式与效率递减·····	(121)
四、效率递减的传递机制·····	(127)
1. 经济结构同质化引起过度竞争·····	(128)
2. 企业技术进步缓慢·····	(134)
3. 市场门槛降低,企业素质难以提高·····	(141)
第六章 经济的成熟与转折:发展中的挑战 ·····	(145)

一、引言.....	(145)
二、何谓“经济成熟”.....	(146)
三、传统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	(149)
1. 资源与需求双重约束的挑战	(149)
2. 资源优化配置的困难	(155)
3. 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因素	(160)
四、经济发展的转折:两种未来前景	(162)
五、转型的可能性与障碍.....	(166)
1. 转型的可能性	(166)
2. 转型的现实障碍	(170)
第七章 繁荣之路:发展的选择	(175)
一、引言.....	(175)
二、模式的转换:几个基本的问题	(177)
1. 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与企业制度的改革	(180)
2. 政府、社区、企业关系的调整	(186)
3. 宏观经济政策的相应调整	(192)
三、发展战略的选择:进入国民经济分工体系	(194)
1. 逐步摆脱社区束缚与区域行政限制, 真正进入市场体系	(194)
2. 通过竞争机制确立国民经济的分工体系	(201)
3. 协调局部发展与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	(204)
四、发展战略的选择:进入国际分工体系	(207)
五、未来的目标:“消灭乡镇企业”	(215)

第一章 政府推动型经济

一、引言

近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浪潮冲击下,我国农村经济已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体制的变革,政策的调整,发展战略的变化以及国民经济调控方式的逐步改变都有力地刺激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而细心地考察这种变化了的新格局,我们不难发现,体制及其相应的政策调整对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最为直接,最为有力。而逐步形成的新体制与政策也将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强烈的影响。这使得我们在研究农村经济发展时,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到这种政策、体制与经济增长、发展的相关关系上来,以找到农村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线索。为此,我们在此书中要分析与探讨一种特殊形态的经济发展模式,即政府推动型经济,要说明这一经济模式所特有的成长、发展规律,及其运行中的主要矛盾。

与广大第三世界中的不发达国家一样,我国经济发展呈现了明显的二元化特征,即现代工业与有限的城市化相结合,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的产业部门;而农村经济则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形态上,低生产率与高度的自给性生产带来了普遍的贫困与落后。长期以来,农民、地方政府以至于整个国家都有着发展农村经济的强烈愿望,并一直在呼喊“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和“农业现代化”的口号,但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始终受阻,现代化的步伐迟迟不

能迈开。今天,我们已能看清这种阻碍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出自牺牲农业支撑工业化、城市化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大量的抽血使农业的积累与发展陷于停滞;二是城乡隔绝的工业化政策阻碍了技术的扩散与劳动力的转移,从而迟滞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当然,这些政策背后还有着更深刻的体制原因。

1978年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分泌出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找寻出路。与此同时,分权化的改革与地方财政包干制的实施则刺激了各级地方政府兴办工商企业以解决就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强烈欲望。因此,与农民承包、个体户、专业户的发展相平行,地方政府推动下的乡镇企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致于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的格局。随着地方政府的职能从行政管理向创办企业、管理经济方面转化、其权力与实力大大扩张,形成了一个以乡镇社区为实体的乡镇经济。而行政机构又是这个经济的核心。政府推动型经济就此而形成。这种经济形态在我国具有相当的广泛性,而其最典型的要数“苏南模式”。它是指地处长江三角洲金三角地带的苏州、无锡、常州市市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我们以下的分析要以其为实例,展开研究。

二、政府推动型经济的基本特征

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模式,它们代表了不同的推进战略与发展途径。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即是以苏南模式为代表典型的政府推动型经济。

所谓政府推动型经济,它是一种既非市场化,亦非政权化的特殊经济形式。它是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型经济中分裂转化而来的,并与某些特殊的历史、自然条件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即资源动员的行政性质;资源配置的市场导向;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社区特

色。社区因素、市场机制与行政力量三位一体，维系着这一经济的运行与发展。

1. 资源动员的行政性质

在我们把视线投向面前的这一经济模型时，立即发现几乎所有的文献毫无二致地把它的基本特征定义为“集体所有制”^①，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实际部门的思想。集体所有制确实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它只是一个表征。我们透过这个定性结论，从现代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观察，发现集体所有制形式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经济机能就是资源动员的行政性质。

农村经济资源的动员，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用土地及资金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产业部门的转移，包括了闲置资源的利用与资源的结构性转换两个方面。行政性的资源动员方式实际上就是由地方政府出面筹集资金、引进技术，抽调土地与劳动力，从事创业活动。这一性质在苏南农村经济的初期工业化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创业过程中，资金的积累是最为关键的。地方政府在筹集资金的政策上，通常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一是利用原有集体农业的积累基金创办工业企业。苏南农村经济经过 60 年代的恢复与 70 年代的缓慢发展，已积累了约人均 200 元左右的公共基金。这笔资金名义上归集体所有，实际上只能由乡村行政机构直接支配，它构成了 70 年代农村工业初期发展的原始积累。二是地方政府向金融机构与社会筹集资金，形成大规模的信用资金。尤其在进入 80 年代以后，地方政府与区外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资金横向拆借规模日益扩大，强制或变相强制性的社会集资规模也相应增大，支撑了 80 年代的三次投资高潮，并使乡镇企业固定资金投资中的自有比

① 参见陶友之著：《苏南模式与致富之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朱通华著：《苏南模式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重明显低于借入比重,形成了典型的“负债经营”。这种状况事实上也反映了资金筹措方面的行政属性。

我们再看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动员方式。在集体农业体制中,苏南农村因人多地少而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它们处于隐性失业状态,而又不能自动地向其他产业转移。此时,地方政府的统一安排是劳动力向新的产业转移的唯一途径。在企业创办过程中,需要多少劳动力、需要多少干部、多少管理人员,各种位置的安排,均由行政机构决定。出现了“支书当厂长,队长做经理”的普遍现象。个人收入差异虽然存在,但它并没有成为调节劳动力部门间转移的支配力量,竞争性的就业机制是不存在的,就业中通行着强有力的行政分配机制。只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此种控制才有所松动。而作为集体所有的土地资源,其在转移过程中体现出了更加明显的行政配置色彩。早期的土地征用,基本上是无代价的调拨,且只是限于一乡一村范围之内。就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土地征用开始有代价了,但仍然是非市场竞争性的,行政性配置的特征十分明显。表现为乡办企业只能征用本乡土地,企业办在本乡,村办企业则只能在村范围内。从而形成了苏南农村乡村工业极度分散布点的非集聚状态,形成了“村村办工业,户户农副工”的兼业化经济。

资源的行政性配置不仅仅存在于资源结构性转移的“原始积累”过程之中,而且在非农产业的再生产过程中,行政机构也直接介入,调节收入分配与使用,将企业的剩余集中起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再投资,这种行政性的积累方式通常被称为“滚雪球”。一般的估计,乡镇企业税后利润的50%以上往往由政府集中,用作再投资,有些地区甚至连固定资产的折旧基金也要上交乡村,被用于扩大投资。

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发挥如此直接的动员作用,除了其行政机构的权力中心地位以外,最根本的导因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集体所